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信仰探索

卓新平自选集

XINYANG TANSUO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GUODO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信仰探索

卓新平◎著

BEIJING SHEKE MINGJIA WENKU

卓新平自选集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信仰探索:卓新平自选集/卓新平著.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4

ISBN 978-7-5656-2270-0

I. ①信… II. ①卓… III. ①宗教—问题—中国—文集
IV. ①D635.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86298 号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

XINYANG TANSUO

信仰探索

卓新平自选集

卓新平 著

项目统筹:杨林玉 责任编辑:王慕飞
责任设计:王征发 责任印制:何景贤
责任校对:李佳艺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印 刷 三河市博文印刷有限公司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mm×1 000mm 1/16
印 张 34.75 插页 2
字 数 390 千
定 价 82.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编委会

顾问 (按姓氏笔画排序)

马玉田 方玄初 石仲泉 史秋秋 李志坚 刘新成
江 平 许 文 吴树青 何卓新 宋贵伦 张文启
陈先达 欧阳中石 金冲及 周一兴 郑必坚 逢先知
袁行霈 顾明远 徐惟诚 陶一凡 陶西平 童庆炳
满运来 戴 逸

编委会主任 崔耀中 韩 凯

编委会副主任 赵 峰 孟春利 刘 颖 梁立新 荣大力 王野霏
杨生平

编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万俊人 王中江 尹 鸿 龙翼飞 叶培贵 白暴力
李 强 刘 伟 孙武权 杨林玉 杨念群 吴国盛
张 际 陈 来 陈平原 陈雨露 赵汀阳 俞 斌
黄天树 黄泰岩 彭 林 韩 震

出版说明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元年。自那一年开始，中国已经走过了波澜壮阔的30年。这是伟大的30年，是改变中国的30年，是震惊世界的30年，也是哲学社会科学蓬勃发展的30年。

在哲学社会科学这30年的辉煌成就里，浸透着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奠基的老一辈专家呕心沥血的求索，也镌刻着寻着他们足迹的后来者追求真理的步伐。“学之大者，国之重器”。我们有责任将这些“大者”潜心研究的成果，重新编辑出版以飨读者。为此，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这一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奉献给读者。它以自选集的体例形式，每年推出一批，争取在几年内达到百种以上。《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系统展示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名家学者30年来的学思精华，展示他们的学术探索历程和风采。同时，为使这套《北京社科名家文库》更加丰富，编委会决定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已出版的《当代著名学者自选集》中挑选符合体例的图书，编辑成《北京社科名家文库·纪念辑》，这将更完整地反映北京学人在学术风范和学术使命上的历史延续。

我们相信，《北京社科名家文库》将能够成为具有文化传承价值的经典性大型出版工程，成为集中展示首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成果的一个窗口。由于我们水平所限，定有不足之处，希望读者和同仁给予批评指正。

编 委 会

2009年11月



卓新平先生

学术自述^{*}

一、学术意识的萌芽

我于1955年3月出生在湖南靠近湘西的慈利县城，原属常德管辖，在张家界设市之后归属张家界。老家的城乡风光就如著名作家沈从文的小说《边城》所描述的那样宁静、自然、迷人，但在边远之域而罕有人知晓。感谢几位画家后来到这里的山区写生，展示出其云山雾罩之中的神奇风貌，家乡的美丽风景如今才得以世界闻名。尤其是高新技术三维电影《阿凡达》问世之后关于“哈利路亚山”的热议，更让张家界吸引了全球各地的众多游客。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家乡却景美人穷，为生机而奔波的家乡父老根本无暇、也没有心情欣赏周边的美景，记得小时候我曾随老乡上山砍柴，迎着矇眊晨曦出发，披着满天星斗归家，只是感到山路太长、悬崖真陡、饮水难找、肚子好饿，根本就不会想到身边还有无限风光作陪、到处都是花香鸟语！6岁时，我跟着到农村工作的父亲去乡下上了小学，晚上经常一个人坐在

^{*} 本文根据拙著《“间”性探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的部分内容改写。

空旷的打谷场上望着头上的星空发呆，有着种种疑问和胡思乱想，但可没有康德那样“头上的星空、心中的道德律”之思的哲学境界。我在上大学之前基本上没有离开过常德，在考研究生之前也没有出过湖南，我们家属于土家族，回想自己身在封闭的大山区农村的这段童年经历，我后来也经常自嘲自己是“土到家了！”当然，感谢改革开放，使我有机会走出湖南，随后又远游异国他乡，这与终生不离故乡的康德则有着明显的不同。

我对于宗教研究的兴趣，始于文革期间上大学的经历。1972年我高中毕业，正赶上当时所谓的“修教路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大学开始恢复招生，虽然以招收“工农兵大学生”为主，但也给应届高中毕业生开了一线门缝，允许极少数高中生直接上大学。当时非常渴望读书的我一下子兴奋起来，希望能得到学校的推荐，因为我自己感到是班上的主要“班干部”，有着“品学兼优”的条件，各科成绩常名列前茅，文史知识也相对丰富。但不久全校推荐了三个学生上大学，我们班上也有一名，却与我无缘。那时高中毕业的其余学生都要“上山下乡”，我也只好与大家一道开始做下乡的准备。不知是作为一种“安慰”还是另外的“安排”，学校又通知我进常德师范的中学教师速成班学习。由于这一“柳暗花明”的新机遇，我又获得了新的学习机会。当时流行的学习理念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此我在常德师范以学习数学为主，还当过数学科代表，曾帮助数学老师整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关于数学的论述。但我当时真正的兴趣在物理，因为我母亲在常德教育局下属的教学仪器站工作，所以我在中学时就对各种物理仪器有着浓厚的兴趣，并在母亲同事的指导下学习过自己装收音机、修理钟表等。当时常德地区新华书店曾来过一本关于人造地球卫星的专业书，还是中学生的我经过软

磨硬泡终于让书店售货员将店里唯一的这本书卖给了我。囊中羞涩的母亲为了支持我的学习，也节衣缩食拿出钱来把同事用过的各种有关物理的旧书买下来供我使用。可进了常德师范才知道学校没有物理专业，了解了我的兴趣爱好的师范校长非常热心，专门为我借来当时湖南师院的物理教材，让我自学，我们的班主任数学老师也对我多有鼓励。在平静的约三个月师范学习之后，新的机缘又一次降临。那时我家乡唯一的一所大专湖南常德师专（现改为湖南文理学院）因抓教学质量而有一位“工农兵大学生”退学，而我们班由校方推荐过去的一位同学因为不愿意学外语专业仅在师专待了不久就又回到了常德师范。原来，应届高中毕业生上大学与“工农兵大学生”待遇不同，“工农兵大学生”可以选学任何专业，而应届毕业生上大学却只能学体育，音乐和外语这三个专业。师范的校长好心地问我愿不愿意去师专，不知内情的我因想学物理而高兴地答应了，到了师专，我虽然几经努力却仍被告之只能学英语专业而别无选择。这样，我就走上了学外语专科之路，从此告别了中学时代想学物理、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之梦。

因为进大学比别人晚上了约三个月的课，我到常德师专后非常勤奋，仅几个月就将学业赶上，但不久也就有了“白专”之嫌。那时的大学课程中一是政治学习和讨论较多，二是体力劳动较多；“工农兵大学生”一周一天体力劳动，我们应届毕业生班则被安排每周两整天体力劳动。所以，我最初曾想利用政治讨论的时间看业务书，但在挨了学校“工人代表”的批评后则改读马恩著作。每次政治讨论时我都拿着一本马恩著作理直气壮地阅读，有一次小组政治讨论时，“工人代表”看见我又在读书实在忍不住了就出面制止，我声明是读马恩著作，生了气的“工人代表”大声斥责，说此时读马恩的书也不行，必须与大家一起讨论政治。主管教学的校长知道此事后也批评了我，并说我是

“调皮捣蛋”。在“白专”压力下的我不敢再专心读英语专业书，而开始广泛涉猎。我们班有一位从长沙下放来的资深英语教师比较关心我的处境，她鼓励我多读各种书籍，指出要真正掌握一门语言就必须了解作为这门语言背景的文化，具有相应的文史哲知识。她还以“为学有如金字塔，既要博大又要高”的警言来给我提醒。这样，我就开始拼命地阅读学校图书馆所藏的各种文史哲书籍，一周读书达十本之多，视力也从入校时的1.5迅速下降，到第二学年就配上了眼镜，并从班上最后一排移到了第一排就坐。本来我曾是学校篮球队的高分“投篮手”，但因近视后找不清篮板而被校队淘汰。在那个“不读书”的年代，学校图书馆有了我这样一个热心读者当然很高兴，每年图书馆写总结，馆长都要对我借书读书加以肯定。我在广泛阅读西方文史哲著作时发现，西方文化与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有着不解之缘。从此我就渐渐对宗教产生了浓厚兴趣，有着某种“潜意识”的关注。这一过程也决定了我此后研究宗教的进路及其重点，即由关心文化而关注宗教，重点放在基督教与西方社会文化，并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研究整个宗教现象，因为我觉得宗教的发展是依附于人类文化而发展的，宗教与文化有着天然的关联。

应该说，我下决心读书始于在常德师范的教师速成班经历，那时失而复得的学习机会使我成了读书“狂人”，不顾别人的不解而独立单行。而真正喜欢上文科、关注社会科学的相关领域则是在常德师专的求学时期。虽然那时学生可读的文科类著作很少，但我除了自己在图书馆借阅书籍之外，还找学校的一些关系较好的青年教师借一些“内部”书籍来看，多为翻译著作和社会科学类的书籍。通常是周六下午向老师借到书，利用周六晚上和周日一整天在家读书，周一清早就必须还给老师；有时一个周末就要读两册或三册的成套书，确实很辛

苦。连我的母亲都常常说我成了一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大家闺秀”。在学校也是如此，我们班上有两、三个同学成了悄悄读书的“另类”。当时学校规定晚上十点熄灯，这样我们就只能或是在路灯下看书，或是躲在蚊帐中打开手电筒看书，而最佳办法是半夜偷偷溜到教室里点上自备的煤油灯看书。我们班教室在三楼，而那位说我“调皮捣蛋”的校长就住在二楼。我们只能轻手轻脚地走进教室夜读，而那时的宿舍房没有卫生间，一旦校长夜里跑下楼到外面上厕所，我们几个同学听到楼梯声就吓得马上吹灭煤油灯静等，直到校长回到房间重入梦乡，我们才开始继续学习。上大学时从同学那儿，我借到了湖南师院、北京大学的英语教材和相关读物，看到了一些英文原版书和教材，也获得少量哲学社会科学的著作。此时我知道了中国科学院有一批文史哲领域的名家，而且还有一个有点“神秘”色彩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在那没有复印机的时代，抄书留存就成为我极大的乐趣。两年下来，不知不觉竟然抄满了十几个笔记本。所以前不久著名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先生来我所讲演时说他自己练字练得手指上起了老趼，我也戏谑自己虽然字没练出来，却也抄书抄出了老趼！

常德师专毕业后我们还是下农村补了一年劳动课之后才分配工作，我则被荣幸地留校任教。我们班仅留了两个人，一位是我们的支部书记，一位是我，因此同学们评论说是留了一个“红专”、一个“白专”。但刚宣布留校，校办就通知我们俩人都参加农村工作队，从不久前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变为去“教育贫下中农”。这对我们班支部书记是强项，对我却是软肋。工作队期间我们的书记经常受表扬、作先进事迹报告，我却是一个默默无语、默默无闻的边缘角色。这一去就又是接近三年的光阴。我刚下农村时曾带来了一些专业书想抽时间自习，但在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后马上就感到农民太苦，而

对我们又很热情，这样唤醒了自己“朴素的阶级感情”，从心底里觉得在此种处境中还抽时间来学习实在于良心不忍、与环境使命不符，因而就自觉地放弃了自学的念头，真正开始与农民打成一片。当时年轻而富有热情的我曾一度写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申请书，但终因放不下“学习”情结而未上交，否则可能就不是今天的我了。在农村的三四年间我开始真正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也观察到一些民间信仰现象。那时中学毕业即下放的同学务农两年后陆续回城，远在农村的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孤寂。我们工作队有重点蹲点安排，也有一般性蹲点安排，重点生产队有两到三位工作队员，而我们作为一般性蹲点的全大队只有两名工作队员。我们工作组长身体有病而经常回城，全大队经常就剩下我一个工作队员，有时大队支部书记也闹点情绪，所以常去公社开会的只有我一人。公社书记常戏称我“一代加二代”，即一代（替）工作组长，二代（替）大队支部书记。有时散会回村已经天黑，一人走山路只好唱歌壮胆，由此也养成了自己“原声态”的“嚎”歌习惯，现在偶尔唱歌后大家拍手称“好”，我仍感觉还是说我是“嚎”！当时一人在农村作群众工作、解决村民各种纠纷、介绍进步青年入党，过足了“党外布尔什维克”的瘾。有一次我们工作队员从公社开完会回村，路遇雷阵雨，便躲到一家农户的堂屋内避雨，我坐在有线广播的喇叭下方，恰巧上面屋顶漏雨，于是我就起身移开，刚刚挪窝，就听到“咔嚓”一声巨响，一道闪电劈下一团大火球，就落在我原来所坐的地方。后来才了解到这次闪电在全公社劈坏了十几座农房，我们大队小学 的墙壁也被劈垮了半截。对照后来的人生经历，也真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味道。在最初到农村任工作队员时，我大病刚愈、身体很虚，一下子就参加繁重的农业劳动、加之收工回农户家后还要帮住户挑水干活，真感到吃不消，当是觉得看书学习的梦是做不成了，必

须面对的现实是生存挣扎。雨季来临，屋外大雨，屋内稻草房顶漏雨，蚊帐顶上铺的塑料布成了堰塞湖底；一旦塑料布破，像酱油颜色一般的积水就会从天而降，因此晚上还需时不时起来用瓢舀水，以缓解天湖的压力。这一时期虽然做不了学问，却体会到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认识到人们在痛苦、困难之际所需要的精神支撑，这对于自己后来研究社会科学、特别是理解宗教很有帮助，这的确是我的重要人生体验。

1977年底，前后在农村劳动、工作快三年半的我终于从农村回到了学校，此时自己虽然已有肩挑百余斤之力，长满老趼的手却已握不住笔。学校决定派我到湖南大学进修三个月，给了我重操学业的宝贵机会。住在长沙湘江边上，我每天早上跑步到岳麓山边的爱晚亭锻炼，在课余则到山下广场设在自卑亭的大学图书馆借书处为自学借还图书。自卑亭为岳麓山登山之始，取“登高自卑”之意，源自《礼记·中庸》“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的说法。这极符合我当时人生和求学的心境，即以自卑之情，来从头自下求知。在长沙三个月的进修期间，我除了完成湖大英训班的课程、到湖南师范学院英语系插班旁听之外，还从自卑亭借到“文革”前大学英语专业四年的八册教材自学。在那年人们积极准备“文革”后全国高考第一回的热情鼓舞下，我的读书梦重又浮现。听说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开始恢复招收研究生，我心情格外激动，生出跃跃一试之念。在友人的介绍和推荐下，我知道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招收宗教学研究生，于是就根据自己的英语专科背景和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报考了宗教学基督教专业硕士研究生，开始为考研做准备。

不料当时的学校领导知道我报名考研后大为恼火，还是那位说我“调皮捣蛋”的校长找我谈话，一见面就劈头盖脸地问道：“你想干什

么，想去当和尚啊？”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又进而指责说：“你就是要当和尚也不要当洋和尚啊！”这就是当时社会一些舆论对我们考宗教学基督教研究专业的认识和评价！从此，我为宗教学专业研究付出了沉重的心理代价，中国当今社会对宗教的误解和偏见也影响到大众对宗教研究者的看法，三十多年来，自己多次被人笑称为“和尚”、“神父”，多次遇到对自己的研究嘲笑、轻视、不屑一顾的眼神或言论；不少人干脆把我们的研究视为另类，觉得我们这些研究者是“脑子进了水”、“精神有毛病”！正是有了这些切身体验，我才会反复呼吁在我们的社会让宗教“脱敏”、希望人们要“善待宗教”；也正是这种人生经历，使我渐有了“宠辱不惊”的平常心。在我考研报上名之后，为了以示警戒，学校随之还派一位副校长亲自“送”我到一所县城中学作为借调人员下放半年。我向当时接待我们的中学校长和教务长讲述了自己要考研的情况，两位中学领导通情达理，当时就决定说，“你既然已是我们中学的人员，由我们负责你的工作安排，那么我们就给你放两个月的假，回家复习考研吧！”这一“绝处逢生”使我又带着行李坐着同一辆车与一言不发的副校长回到了常德，然后我一头躲在家里复习，不再去师专上课。当年5月份，考研初试完的第二天清早，我就自己买票坐长途汽车去了那所县城中学，并以知恩图报的心情拼命教课，辅导准备高考的学生。直至接到来京考研复试的通知后，我带着感激的心情才离开那曾有我农村工作两年、又有我中学特殊教学几个月这种不凡人生经历的小县城，从此开始走出常德、走出湖南、并且走向世界。

二、学术专业的训练

来到北京三年读研，对我而言是一种“重生”。我对待学业基本上

可以用如饥似渴、如痴如醉来形容。我是1978年入校的世界宗教研究系硕士研究生中年龄最小的，那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师如林，同学中也藏龙卧虎，因此既有动力、更有压力，只能以拼命求学来报答这一春临大地的时代、报答慧眼识人的恩师、报答热情推荐的朋友、报答给我机会的乡亲。我们最初借住在北京师范大学，而上课则在北京师大、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三处跑动，借阅专业图书还使我熟悉了当时设在白云观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图书馆、免费对我们开放的北京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以及在王府井附近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社会科学分馆。北京师大为我们属于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也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生活条件，大学图书馆向我们开放、通宵亮灯的教室给我们自习。那时的学生们为了在图书馆占座学习，多次把图书馆的玻璃门挤破。我们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也自搭了简易房作为教室，晚上室内生个火炉，让大家有学习之地。回忆起这段经历，真是让人激动难忘。

由于当时的大学本科及专科本来就没有宗教学专业，我们的读研从专业意义上实际乃从零开始，但感谢北京，因其作为首都有着极佳的学术文化氛围，我们才有机会在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其人文领域得到系统训练。当时设在北京师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为全院研究生开设了大课，请来各个领域在国内最著名的专家授课，我们在这一层面曾听到周扬、于光远、许涤新、唐弢、宦乡、王佐良等名家的报告，印象深刻。世界宗教研究系的课程则为开放性的，我们至少可以旁听本院其他系的课程，北京师大的相关课程以及北京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些课程，记得当时听过哲学所汝信、邢僂思、李泽厚等老师的哲学、美学课，北京大学张世英、朱德生、陈启伟等老师的西方哲学课，朱龙华老师的世界历史课，中国人民大学郑杭生老师的

社会学课等。我所听过的世界宗教研究系本系的课程有任继愈先生讲授的中国哲学史、佛教史、古汉语，赵复三先生讲授的基督教史，高望之先生讲授的犹太教概论，牙含章先生讲授的中国无神论史，吕大吉先生讲授的宗教学理论及外国无神论史，金宜久先生的伊斯兰教史，以及逻辑学、道教、东正教、宗教心理学等，加之当时广泛的阅读，自己觉得一下子就掉进了知识的海洋，有着久旱获甘霖般的痛快。

来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之后，才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有十多个涉及国际问题的研究所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建立的，而世界宗教研究所是其中唯一由毛泽东主席建议设立的。毛泽东主席于1963年12月30日对中央外事小组“关于加强对外研究的请示报告”做了重要批示，其中特别指出：对世界三大宗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任继愈用历史唯物主义写的论佛学的文章有如凤毛麟角，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世界史。根据这一重要批示，周恩来总理对开展宗教研究也做了具体指示：要研究世界三大宗教的理论、现状和历史，包括它们的起源、教义、教派、经典等。在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与直接指示下，任继愈先生于1964年组建成立了世界宗教研究所，我国从此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专门研究世界宗教的学术机构。知道我们研究所的这一历史，大家当然也非常自豪，无论是学什么专业，大家都找到毛泽东主席谈到的任继愈先生所著《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来学习，并津津乐道地讨论任继愈先生在此书最后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最基本的“三把钥匙”。在基督教研究专业领域，导师给我们四位研究生进行了专业方向分工，包括天主教研究、基督教现状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研究，因为我年龄最小而派给

我较难的专业，即基督教思想研究。

1981年我们这届研究生毕业，我也顺利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当时中国研究宗教的气候可说是早春二月、乍暖仍寒。记得我们硕士毕业庆祝会前我和另一位同学随单位司机去采购东西，付款开发票时售货员问，“开什么单位呀？”我们说“开宗教所”，售货员就很惊讶地说：“你们是和尚啊！”此时同来的司机马上反应很快地指着我们两位研究生说：“他们两个是，我不是！”社会仍有一种谈到宗教就避而远之的感觉。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留在所里，而研究所也打算让我出国留学深造。但后来我去德国留学，也纯属“阴差阳错”。原定公派我去美国留学，最初曾考虑德鲁大学，后来导师让我联系芝加哥大学，因为美国宗教学最有名气的是芝加哥学派和哈佛学派，那时两派的领军学者在芝加哥为伊利亚德，在哈佛为史密斯。为此，我曾参加中国社科院组织的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在80多位学员中，我曾在班上“托福”模拟考试中考得第一，在后来参加教育部的出国英语考试中也与另一位学员成为这个培训班参考人员中的并列第一名，但研究所最后决定改派我去联邦德国留学，其理由是德国的学术口碑很好，包括德国的哲学、神学、宗教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我还可以多学一门外语等，而直接原因是德方主动提供了奖学金。我问导师应如何进行专业准备，导师送给我一大厚本英文的世界文明史让我通读，并要我最好还能读读英文的《四书》、《五经》。因为不了解情况，我拿到德国慕尼黑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后放弃了教育部安排去上海同济大学脱产学习德语一年的机会，急急忙忙托人找了一位私人老师教了一点德语基础就闯到了德国。到了慕尼黑才知道入学还需通过大学德语考试，而这时离大学考试时间就只有三个多月了。我在忙完入住、办居